

“打倒孔家店” 研究

杨华丽 著



人 民 出 版 社

“打倒孔家店”研究

杨华丽 著

人 民 出 版 社

责任编辑:陈寒节

责任校对:湖 催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打倒孔家店”研究/杨华丽 著. - 北京:人民出版社,2014.5

ISBN 978-7-01-013388-1

I. ①打… II. ①杨… III. ①五四运动-研究 IV. ①K261.107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4)第063140号



“打倒孔家店”研究

DADAO KONGJIADIAN YANJIU

杨华丽 著

人民出版社 出版发行

(100706 北京市东城区隆福寺街99号)

北京龙之冉印务有限公司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2014年5月第1版 2014年5月北京第1次印刷

开本:710毫米×1000毫米 1/16 印张:21.75

字数:319千字 印数:0,001-2,000册

ISBN 978-7-01-013388-1 定价:43.00元

邮购地址:100706 北京市东城区隆福寺街99号

人民东方图书销售中心 电话:(010)65250042 65289539

我们需要新的历史阐释平台

——代序

李 怡

不知不觉中,我们的“五四”新文化运动距今竟然已有了九十多个年头!这时间刻度猛然间的浮上心头,还真有点让人惊诧。将近一百年的光阴,本来足以让历史形成一系列基本的沉淀,但事实却是,“五四”所提出和留下的许多话题包括最基本的民主、科学、自由、启蒙等等在今天依然莫衷一是,其分歧并不亚于“五四”的当时,甚至,连“五四”本身的意义和基本形象都还存在着莫大的争议。直到今天,围绕“五四”,我们几乎还在进行着一场没有硝烟的文化激战,更严重的问题在于,这场战争究竟在多大的意义上立足于对历史事实的把握,战争的双方又是否具有了文化研讨所必需的思想认同的平台?

“战争”之所以产生,乃是因为“五四”一直是各种思想潮流(乃至各种党派、各种政治力量)谈论现代中国文化、历史的起点,对所谓“五四”的理解和认识,更是人们分析、评价和判断中国现当代社会文化问题——包括成就和局限的主要“根据”。政治革命家早有“新民主主义开端”之说,保守的政治独裁者(如蒋介石)也曾指责“自由主义”的“五四”是背弃了“中国固有的文化精神”,新时期中国知识分子给予许多的“启蒙”的期待,而西方汉学(尤其美国汉学)更有“激进”、“偏激”的种种忧虑……今天,“五四”新文化运动九十周年的纪念一点都不能减少围绕它的种种争论。问题是:他们谈论的是同一个“五四”吗?“五四”究竟是什么?它是怎样“构成”的?“五四”可以分层认识吗?“五四”在总体上实现了什么功能?

我认为,在今天,我们对“五四”的解读,应该注意到作为现代知识分子群体在那个特殊历史时期的生存状态,他们各自的姿态及相互的联系,在将“五四”作种种简明的定性之外,一个丰富和复杂的现代文化探索者与创造者的知识分子群落的巨大存在同样值得我们高度重视,我们不妨可以将之称为——五四文化圈。

只有厘清了五四文化圈的基本形态,今天的历史阐释才能走出“战争”的阴霾,寻找到一个新的阐释平台。

在我看来,生存于五四“圈子”中的知识分子,自然有着各自具体的思想认识和文化主张,其差异性显而易见,但是,就在“五四”时期,其实他们表现出了不能忽视的认同度。欧游归来,宣扬“西方文明破产”的梁启超常常被人们视作“思想保守”,但他却对新文化运动抱有很大的热情和关注,甚至认为它们从总体上符合了他心目中的“进化”理想;甲寅派一直被简单目为新文化运动的“反对派”,其实当年《甲寅》月刊的努力恰恰奠定了《新青年》出现的重要基础,后来章士钊任职北洋政府,《甲寅》以周刊形式在京复刊,与新文化倡导者激烈论争,但论战却没有妨碍对手双方的基本交谊和彼此容忍;学衡派也竭力从西方文化中寻找自己的理论支持,并且并不拒绝“新文化”这一概念本身;与《新青年》“新文化派”展开东西方文化的大论战的还有“东方文化派”的一方如杜亚泉等人,他们同样具有现代文化的知识背景,同样是现代科学文化知识的传播者;甚至,后来走上专制独裁、批评“五四”的蒋介石也在他的五四日记中对这一运动深表赞扬——正是这样的“认同”,为这些生存群体可以形成以“五四”命名的文化圈奠定了基础。而一个巨大的存在某种文化同约性的文化圈的出现则是现代中国文化发展的十分宝贵的“思想平台”——它在根本上保证了现代中国文化从思想基础到制度建设的相对稳定和顺畅。

当然,在这个文化圈的内部,也存在显而易见的思想分歧。五四新文化派具有无比清醒而强烈的现实忧患体验,他们的锐利的批判从根本上打破了沉闷的文化生态,推动了历史的有效行进,——他们是现代文化的“火车头”;即便是总体上相对激进的群体,包括《新青年》、《新潮》知识分子——

他们各自的“激进”程度、方向和阶段却又并不相同,不仅有具体问题的认知差异,也有中心与边缘之别,如鲁迅就一直自居边缘。就其中的“文学革命”而言,也既有《新青年》同人的首开风气之举,又有创造社所谓的“文学革命第二阶段”,对于“第二阶段”的郭沫若来说,其狂飙突进的气概与他对孔子等先秦文化传统的赞美又相伴而生;有总体上相对保守的群体,包括《学衡》、《东方杂志》与林纾等,但他们各自“保守”的程度、方向和阶段同样并不相同;还有更多的个体,或许在某些方面倾向于前者,又在另外的方面倾向于后者,有时候,简单的“激进”或“保守”概念很难对他们加以准确的定义,如梁启超、梁漱溟。

不过,有一点值得注意,这就是其中相当数量的所谓“保守”派,他们都是作为现代知识分子的一员在关注着民族文化的现代命运,都在现代世界的巨大背景上面对着“中国问题”,这都从根本的意义上将他们与前朝旧臣、乡村遗老严格区别开来,这些现代中国的知识分子不管观点还有多大的差异,都一同站在了五四历史的起跑线上,组成了“文化圈”的色彩斑斓。

我认为,正是这些知识分子的色彩斑斓又处于同一历史过程中的事实形成了现代文化发展的基本的弹性和必要的张力,形成了现代中国文化在总体上的健康与宽大,所以无论我们能够从胡适、陈独秀等人那里找到多少表达“二元对立”的绝对化思维的言论,我们都不得不正视这样一个重要事实:中国的现代文化并没有因为这些先驱者简单的新/旧对立言辞而变得越来越简单,而是越来越丰富,越来越多样和有韧性。分歧、矛盾的思想倾向的存在反过来恰恰证明了现代中国文化自五四开始的一种新的富有活力的存在,不同趋向的各个方面的有机的张力性的组合其实保证了现代文化发展的内在弹性和回旋空间,而在思想交锋中坎坷成长的新文化也就尤其显示了自身的韧性——它毕竟经受住了来自方方面面的质疑和挑战,这难道不正是现代中国文化、不正是现代中国文化之中扮演拉动力的五四新文化最富魅力的所在?在这样的丰富、复杂的文化环境中蓬勃向上的中国文化不就与中国古代文化形成了最显著的“结构性”的差别吗?

五四文化圈的存在和基本生态为现代中国知识群体的存在和发展奠定

了重要的基础,形成了对20世纪上半叶影响深远的某种“机制”性的东西,我曾经指出,这就是中国现代文化发展的“民国机制”。民国机制并不属于那些专制独裁者,而是根植于近代以来成长起来的现代知识分子群体,根植于这一群体对共和国文化环境与国家体制的种种开创和建设,根植于孙中山等民主革命先贤的现代理想,它的雏形便是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中形成的,在这个意义上,令中国现代文化的发展都广泛得益的这种“民国机制”本身就属于五四文化“遗产”,只不过是我們目前还重视不够的一份遗产。

对五四文化圈思想平台的清理,对“民国机制”的发掘,最终都是为了对那些复杂的历史现象做出“返回历史现象”的解释,推进学术的发展。

学界近年来关于“五四”的批评,至少包括七大方面的内容:少数知识分子的偏激导致了全民族文化的悲剧;彻底反传统、割裂民族传统文化;惟我独尊,充满了话语“霸权”;引入线性历史发展观、激进主义的文化态度,导致了现代中国一系列文化观念上的简陋甚至迷失;客观上应和了西方的文化殖民策略;开启了现代专制主义特别是“文革”思维的源头;白话取代文言,破坏了中华民族的语言流脉;套用今天的一个说法,可谓是五四“七宗罪”。在我看来,围绕以上诸方面所发生的分歧与批判性意见,恰恰呈现出了从历史知识到思维理路等多方面的缠绕和混沌,正是这样的缠绕和混沌,最终让我们以扭曲的方式将“五四”时代描述为一场想象中的似是而非的激战,扭曲的想象让“五四”的意义变得有点暧昧不明了。

对于今天的人们而言,将近一百年前的历史似乎早应该成为了稳定的“故纸堆”中的材料,只等待我们的重读和阐释。然而,问题却远远没有这样的简单,分析近年来那些对“五四”的批评,我们可以发现一个多少让人有些惊讶的事实,那就是一系列基本史实其实都还充满了迷雾,我们的不少批评性的判断竟然是建立在许多虚幻不实的“传说”的基础之上。我以为,以“传说”而不是事实为基础,正是五四新文化运动被任意涂抹的主要原因。

其中,“打倒孔家店”一贯被人们当作“五四”新文化运动彻底反传统的重要表现。然而,这一说法从能指到所指实在都是谬误百出的。不返回民

国的现场,就根本无从发现其中的真相。杨华丽博士论文的重要贡献就在这里,她阅读了大量的历史材料,从中梳理出种种为人忽略的细节,逐步“复现”了所谓“打倒孔家店”的来龙去脉,这样的结论让人耳目一新,这样的研究构建起了“民国文学”的历史原貌,无论是观点、材料还是研究方法都具有启发意义。

杨华丽是我指导的博士研究生,所谓“指导”也不过就是与她讨论过一些研究方法的问题,整个问题的写作都是她努力耕耘的结果。今天,这一成果有机会出版,在海峡两岸同时发行,我觉得很有意义,因为,我们都拥有一个共同的现代思想之源——五四,我们都应该通过对民国历史的清理建立更能够通融的阐释平台。

祝愿杨华丽博士在学术研究中取得更大的成绩!

2012年5月21日于北京

目 录

我们需要新的历史阐释平台(代序)	李怡	1
绪论		1
第一章 “打孔家店”:思想渊源的追踪		21
第一节 戊戌到辛亥:反孔的“过渡时代”		28
一、反孔反礼教及对圣贤、祖宗的革命		33
二、反三纲		44
第二节 “毁孔子庙罢其祀”:共和之后昙花一现的反孔		48
一、“毁孔子庙罢其祀”:蔡元培与反孔		49
二、共和初建时期的反孔:昙花一现		58
第三节 “个人”与“自由”:两个概念工具		60
一、《河南》杂志:文明之导线		63
二、《甲寅》月刊:一个过渡的思想平台		78
第二章 “打孔家店”:新文化运动背景下的发动与展开		85
第一节 《甲寅》月刊·《青年》·《新青年》:两次嬗变		85
一、《甲寅》月刊/《青年》:政治/伦理		85
二、《青年》/《新青年》:思想的递嬗		101
第二节 时势及其应对:反孔的必然及面相		117
一、陈独秀的反孔		120
二、吴虞的反孔		127
三、常乃惠:一个“青年”的转变		134

第三节 鲁迅、周作人、钱玄同的反孔	138
一、思想革命与文学革命:相互扭结	138
二、S会馆:寂寞及寂寞的应和	140
三、《狂人日记》:在思想革命-文学革命中	149
第三章 “打孔家店”:在论争中深入	154
第一节 东西文化论战:重评陈杜之争	155
一、陈杜之争:质问与回应	158
二、守旧与革新:必然的冲突	161
第二节 新旧思潮论战:重评林蔡之争	168
一、林蔡之争:发生与结束	170
二、林蔡之争:意义及评价	181
第三节 何谓“新文化”:重评新文化派与“学衡”派之争	185
一、论争:在“新文化”与“真正新文化”之间	187
二、重估“学衡”派的“新文化”	204
第四章 “非孝”:拷问“家庭问题”	212
第一节 父与子之间:以《非孝》事件为中心	215
一、“时代转弯角上的奇景”:施存统与《非孝》	217
二、“木瓜之役”:《非孝》事件与浙江一师风潮	222
三、父与子之间:被误读的《非孝》	227
第二节 兄与妹之间:以李超事件为中心	232
一、李超之死:个人的悲剧	232
二、李超与李超之死:形象塑造与意义挖掘	236
三、李超之死与“父为子纲”	245
第三节 母与女之间:以冯沅君早期创作为例	246
一、艰难的挣扎:“爱情”的叛逆一代	248
二、缠绵悱恻:冯沅君的“爱情”之痛	252
三、爱情之痛背后:从《淘沙》的角度看	255

第五章 “终身大事”:婚姻与爱情问题	260
第一节 言说中的“娜拉”:从《终身大事》到《伤逝》	261
一、“娜拉”在中国的诞生	261
二、《伤逝》:别样的“娜拉”言说	268
第二节 言说中的“自杀”:赵五贞事件	271
一、赵五贞:“舆论”中“自刎”的“新娘”	273
二、赵五贞:“研究”中“自杀”的“赵女士”	275
第三节 爱情与性:两次论争与两次讨论	283
一、“爱情”何谓:透视“爱情定则”大讨论	285
二、“爱情定则”大讨论:在性与道德的论争中	297
结语	304
参考文献	314
后记	333

绪 论

在 19 世纪中后期开始启动的中国现代化进程中,孔子、儒家和儒学的命运在 20 世纪的百年里也遭遇了“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这个变局,与 20 世纪中国思想界、学术界、政治界、教育界的精英们息息相关,因为正是陈独秀、李大钊、瞿秋白等马克思主义者,蔡元培、陶希圣、戴季陶等三民主义者,严复、胡适、殷海光、林毓生等自由主义者,吴稚晖、刘师培等无政府主义者,梁漱溟、熊十力、唐君毅、徐复观等现代新儒家,以及《新青年》派、“学衡”派、东方文化派、新启蒙派等的代表人物针对孔子、儒家和儒学的言说,导致了 20 世纪复杂的思想史、伦理史、儒学研究史的诞生。

当我们随意翻检 20 世纪的思想史、伦理史、儒学研究史,或者阅读关于《新青年》派、“学衡”派、东方文化派、新儒家等流派,关于新文化运动、新启蒙运动乃至“文革”时期的批林批孔运动等等的研究成果,“打倒孔家店”这个与孔子、儒家和儒学的命运关系密切的词组都会不时闯入我们的视域。然而让人迷惑的是,各种意识形态下的各种立场的人都在运用这个词组,他们作出的各样阐释形成了庞大而混杂的历史迷雾。一旦我们试图去详细审思“五四”与孔子、儒家与儒学的关系,就不得不注意到“打倒孔家店”与“五四”新文化运动之间的胶着状态,并使我们深深感知到透视“五四”新文化运动的艰难。

在这种情况下,对新时期以来学界研究“打倒孔家店”的成果做一次综合考察,也许是我们深入研究“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一个重要准备工作。

(一)“打倒孔家店”:一个口号

新时期以一场关于真理问题的大讨论,解放了建国以后尤其是“文革”

期间国人被紧紧禁锢的思想。与之相随的,是文史哲等各个领域在诸多方面的复苏与再出发。对于中国哲学研究来说,“1980年代上半期……已开始尝试打破教条、禁区,……该时期最引人注目的是孔子的再评价问题。”^①或者说,“1980年代,对孔子的再评价是中国哲学领域思想解放的突破口”。^②作为此期具有代表性的研究成果,《从五四启蒙运动到马克思主义的传播》^③的第2版于1979年面世,发挥了重要的研究导向作用。就在该书中,丁守和、殷叙彝先生以“打倒孔家店”命名反封建的新文化运动,独立成节,并在该节中多次将“打倒孔家店”作为固定名词来使用。而真切反映1980年代上半期这个过渡时期特色的《孔子及孔子思想再评价》,是山东大学1978年召开的文科理论研讨会上历史组10位学者的文章的集结。这些文章集中地反映了他们对“四人帮”批孔的批判,以及对孔子及孔子思想做出重新评价的努力。事实上,集中收录的庞朴的《孔子思想的再评价》^④、张岂之的《真孔子与假孔子》以及朱玉湘的《试论“五四”时期思想界对孔子的评价》正是揭开新时期孔学研究帷幕的重要文章。然而很明显,这一时期,“打倒孔家店”依然被作为一个习以为常的“口号”在使用——庞朴认为:“五四新文化运动号召‘打倒孔家店’,揭开了现代批孔的序幕,立下过不朽功勋。”^⑤与此类似的说法出现在朱玉湘的文章里:“‘五四’运动提出了‘打倒孔家店’的战斗口号,……立下过不朽的功勋”,^⑥“鲁迅是‘五四’时期打倒孔家店的主将”,^⑦此外,他的文章中说“五四”时期的尊孔派对孔子做出了不合实际的评价,但“即使针对反动势力掀起的尊孔复古逆流,提出‘打

① 郑家栋:《断裂中的传统:信念与理性之间》,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305页。

② 郑家栋:《断裂中的传统:信念与理性之间》,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310页。

③ 丁守和、殷叙彝:《从五四启蒙运动到马克思主义的传播》,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63年6月1版,1979年4月2版。

④ 庞朴该文最初发表于1978年8月12日《光明日报》,这是最早提出“重新评价孔子”问题的文章。

⑤ 山东大学历史系编:《孔子及孔子思想再评价》,吉林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99页。

⑥ 山东大学历史系编:《孔子及孔子思想再评价》,吉林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152页。

⑦ 山东大学历史系编:《孔子及孔子思想再评价》,吉林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159页。

倒孔家店’的思想革命和文学革命的新文化运动倡导者和参加者,对孔子的态度及其思想的评价,也是有区别的。”^①还说胡适是个“被卷进了‘打倒孔家店’洪流的洋奴”。^②可见,在当时的语境中,“打倒孔家店”是与新文化运动密切关联的“口号”,的确就是一个不言自明的“常识”。

五四运动 60 周年纪念日前夕,五四运动的参加者许德珩说:“五四运动时有个口号,叫‘打倒孔家店’,就是反封建。针对这个口号的叫‘保存国粹’。”^③80 年代以后尤其是 90 年代以来,“打倒孔家店”出现的频率更高。如陈旭麓在其论著《近代中国社会的新陈代谢》中说“从戊戌的‘托古改制’到‘五四’的‘打倒孔家店’是一种历史性的进步”;^④余英时认为“康有为提倡孔教,与当时‘打倒孔家店’针锋相对”;^⑤房列曙等则认为“新文化运动的倡导者们……以《新青年》为主要阵地,以进化论观点和个性解放思想为主要武器,批判维护封建专制制度的旧礼教、旧道德,提出了‘打倒孔家店’的口号”;^⑥柳士同在 2009 年还认为当年提出了“打倒孔家店”的口号,并为其合法性辩护。^⑦以《中华读书报》为例,据笔者初步查阅与统计,从 2004 年到 2009 年 7 月,有 51 篇文章涉及到“打倒孔家店”(有少许文章是“砸碎孔家店”),而且多与“口号”相连。而在中国知网上以“篇名”为“孔家店”作为检索条件,会得到这样的结果:新时期以来学术界共有 27 篇相关论文发表,从陈本铭之文《孔子教育思想试评——兼论五四时期“打倒孔家店”的口号》^⑧到王东、纳雪沙之文《“打倒孔家店”是五四运动的口号吗?——五

① 山东大学历史系编:《孔子及孔子思想再评价》,吉林人民出版社 1980 年版,第 153 页。

② 山东大学历史系编:《孔子及孔子思想再评价》,吉林人民出版社 1980 年版,第 152 页。

③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编:《五四运动回忆录》(续),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79 年版,第 582 页。

④ 陈旭麓:《近代中国社会的新陈代谢》,上海人民出版社 1992 年版,第 381 页。

⑤ 余英时:《五四运动与中国传统》,余英时:《现代危机与思想人物》,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05 年版,第 60 页。

⑥ 房列曙等编著:《中国近现代史》,合肥工业大学出版社 2004 年版,第 189 页。

⑦ 柳士同:《重温“打倒孔家店”》,《书屋》2009 年第 3 期。

⑧ 陈本铭:《孔子教育思想试评——兼论五四时期“打倒孔家店”的口号》,《福建师大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79 年第 3 期。

四精神实质新论》,①“打倒孔家店”几乎无一例外地出现在每一篇文章中,而且大都与新文化运动的“口号”之说相联系:

这次运动……响亮地提出“打倒孔家店”的口号。②

“打倒孔家店”则是“五四”时期反封建主义的革命战斗口号。③

急进民主主义者……发表了大量文章。“五四运动”后,鼓动这一思潮影响最大的一个口号,就是“打倒孔家店”。④

“打倒孔家店”是五四运动提出的著名口号。⑤

在万马齐喑的旧中国,“打倒孔家店”这一口号的喊出,的确起到了振聋发聩、解放思想的作用,其功绩不可抹煞。⑥

他们喊出“打倒孔家店”……其意向所在,正如前面所说,并非仅仅和孔老先生本人过不去,也不是全面推翻自己的文化根基,而是试图找出中国积贫积弱的病灶,然后再加以疗救。⑦

……

在这林林总总的表述中,“打倒孔家店”与新文化运动往往成为一枚硬币的两面。这固然为我们解读新文化运动提供了一个方便的入口,然而细查这些论述可见,论述者对“打倒孔家店”这个“口号”本身,对它之于新文化运动的正负面价值所做出的价值判断,却并不如铁板一块。因此,对其构成的非常芜杂的阐释场景,我们需要仔细辨析。

① 王东、纳雪沙:《“打倒孔家店”是五四运动的口号吗?——五四精神实质新论》,《新视野》2010年第4期。

② 陈本铭:《孔子教育思想试评——兼论五四时期“打倒孔家店”的口号》,《福建师大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79年第3期,第32页。

③ 严北溟:《孔子要平反,“孔家店”要打倒》,《社会科学辑刊》1981年第1期,第3页。

④ 韩达:《“打倒孔家店”与评孔思潮》,中华孔子研究所编:《孔子研究论文集》,教育科学出版社1987年版,第408页。

⑤ 王海滨、卢建华:《论打倒孔家店的现实意义》,《北京师范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1989年第2期,第76页。

⑥ 郭沂:《“打倒孔家店”与中国传统文化的现代命运》,《齐鲁学刊》1989年第3期,第52页。

⑦ 胡发贵:《民主与人权——对“打倒孔家店”的再审视》,《唯实》1999年第4期,第27页。

大致说来,学者们的立场有以下几种:第一,肯定“口号”的存在及其正面价值型。这种观点认为,新文化运动中确实提出了“打倒孔家店”这一口号,并从反封建的必然性等为这一口号的合法性辩护,代表性文章如柳士同的《重温“打倒孔家店”》、徐顽强的《评“五四”时期的“打倒孔家店”》。^①这类观点,是对此前尤其是“文革”发生前主流观点的承续,而论析更为细致。第二,肯定“口号”的存在但否认其正面价值型。这类观点认为新文化运动中确实提出了“打倒孔家店”这一口号,但认为正是这一口号,代表了新文化运动的发起者们对中国悠久传统文化的决绝态度,而这不仅导致了中国文化在现代的断裂,而且象征着中国激进主义的发生,导致了现代史上革命思维的形成,并且在事实上导致了“文革”的出现。这种观点在韩达1982年发表的《“打倒孔家店”与评孔思潮》中已初见端倪,而在海外学者类似观点大量涌入大陆之后,呈逐层推进趋势,并在80年代中后期至90年代上半期,成为学界的一种主流认识。与这类观点相对,有人否定该“口号”存在于新文化运动中,认为它只是后来者在阐释新文化运动的过程中强加于其上的一个说法。事实上,持这类观点者往往对“打倒孔家店”这一“口号”的出现过程进行关注,并对其与新文化运动的关系进行细微的辨析,正如王东、纳雪沙在《“打倒孔家店”是五四运动的口号吗?——五四精神实质新论》,尤其是宋仲福在《关于“打倒孔家店”的历史考察》^②中所做的那样。对于新文化运动反孔批儒的正面价值,他们有的仅只部分地肯定,或者将新文化运动的价值重新阐释,如王东、纳雪沙认为新文化运动的精神实质在综合创新,刘济生认为打倒孔家店反映不了新文化运动的实质,^③宋仲福则说不能让“打倒孔家店”这个冒牌货登上历史舞台去领奖。

这种种分歧的存在,固然有学人们对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前理解在内,但

① 徐顽强:《评“五四”时期的“打倒孔家店”》,《湖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2年第2期。

② 宋仲福:《关于“打倒孔家店”的历史考察》,《孔子研究》1992年第2期。

③ 刘济生:《打倒孔家店与打倒秦家店孰轻孰重——新文化运动和五四运动重新解读》,《炎黄春秋》2004年第4期。

不可避免的是,“打倒孔家店”这一说法尤其是其中“倒”字本身所暗示给研究者们的负面信息,为负面评价的出现提供了温床。吕振羽早在1940年就已指出,“在反封建文化斗争的高潮中,曾产生一部分自由主义分子的盲目复古的倾向,即反历史主义的倾向。他们无视伟大祖国文化的优良传统,几乎认为中国历史上的一切都是要不得的,在‘打倒孔家店’的口号下,一时就抹杀了发展到那样高度的中国封建文化的一切,不去估计其巨大的创造成果和它对人类文化的巨大贡献。”^①指出“打倒孔家店”具有历史虚无主义倾向的不只是吕振羽,在署名“本社”的《五四运动与民主主义》一文中,就针对“有人批评五四时代的文化运动,认之为非民族的”,而指出它的不公允:“这批评是不公允的。诚然五四时代人物对封建文化的批判不能使我们今日完全满意,但这并不是因为他们的批评太激进了,而是因为他们批判中缺少历史主义;正因为他们不能运用历史主义来执行批判,因此他们的批判反而嫌不够,有时反而留下了让封建文化视为避逃藪的罅隙。也因为他们不能运用历史主义来执行批判,他们常只能一般地鄙视旧有的文化遗产,但是决不因此,五四时代的思想文化是完全脱离了民族基础的;恰恰相反,说起中国民族文化的发展来,那么作为民族文化的继承人的是他们而绝不是他们的反对派——国粹论者。……五四新文化运动实在当得起是一个民主的民族的新文化运动,虽然没有能彻底地完成。”^②时隔40余年,当代的韩达也感知到“打倒孔家店”“这个口号具有严重的缺点,即对民族文化采取虚无主义态度和极端、片面的思想方法。”^③而为新文化运动反孔非儒的合法性进行辩护的学者,“尽管……都在说明五四时期提出它的合理性、进步意义,同时也从多方面论证了当时并未打倒孔子和儒学,也未否定传统文化。但是,由于‘打倒’这个概念的确定性,而‘孔家店’则是明显的贬意

① 吕振羽:《创造民族新文化与文化遗产的继承问题》,《中国社会史诸问题》,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61年版,第120页。该文的一部分曾以《“亚细亚的生产方法”和所谓中国社会的“停滞性”问题》之名,发表于《理论与现实》第2卷第2期,1940年10月15日。

② 本社:《五四运动与民主主义》,《理论与现实》第2卷第1期,1940年5月15日。

③ 韩达:《“打倒孔家店”与评孔思潮》,中华孔子研究所编:《孔子研究论文集》,教育科学出版社1987年版,第412—413页。